

# 多语社团微观语言政策协商——基于一支多语背景乐队的质性案例研究



姚洋\*, 苏秋军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包含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维度, 深入探究多语社团的围观语言政策规划与协商过程可从微观视角指出“语言问题”并对语言多样性治理提供参考。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对中国本土某多语背景乐队的语言生活场景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与深度访谈, 通过对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描述与呈现, 折射出其语言生活中的语言规划及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研究发现: 在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中, 语言政策仲裁人 (language policy arbiter) 影响较大; 在协商过程中, 社团各成员以演进式的社会学习方式, 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以构建空间语库, 完成语言社会化过程并适应社团多语生活; 经此所构建的多语社团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合, 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 (translanguaging); 其超语实践表现出“音乐语言+身势语+碎片化多语+单语”的多模态多元性质, 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 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相同。本文提出, 针对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建立在对实际的话语空间为考量的基础上进行; 鼓励并协助多语社团成员灵活运用多模态多元话语组合方式构建空间语库可有效帮助多语社团成员适应多语生活。本文为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语规划研究提供了较为新颖的实证性案例参考, 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关键词:** 多语社团; 微观语言政策; 超语实践

**DOI:** [10.57237/j.ssr.2022.01.001](https://doi.org/10.57237/j.ssr.2022.01.001)

## Micro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f a Multilingual Band

Yang Yao, Qiuju S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macro, meso and micro. To explore the language policy planning and negotiation process of multilingual community can elicit “language issu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language diversely. This study conducts a one-year qualitative follow-up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on the Language Life of a multilingual background band in China. Through describing and presenting the language practice and dynamic ideological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multilingual community, the study reflects the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negotiation process in its Language Life in a micro scop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Language policy arbiter has a greater imp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micro language policy

\*通信作者: 姚洋, [yaoyang@swfu.edu.cn](mailto:yaoyang@swfu.edu.cn)

planning and negotiation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negotiation,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make different linguistic choices in an evolutionary way of social learning to construct a situational corpus,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d adapt to the multilingu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e corpus they constructed is not a simple monolingualism or multilingualism, but a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The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shows a multimodal and multilingual nature in a way of “musical terms + body language + fragmented multilingualism + monolingualism”. With different of discourse environments, the strategies of multimodal combination are varied.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for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discourse environments, and that encouraging and assisting members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to construct multimodal and multilingual discourse and situational corpus flexibly can effectively help members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dapt to their multilingual life.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and empirical case study for the micro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of multilingual societies, which can have some enlightenment.

**Keywords:**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Micro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Translanguaging

## 1 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理论性和政策性极强的学科，属于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augen [1]在研究语言规范化问题中首次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为了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而准备的，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此后，Haugen [2]将语言规划进一步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是言语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过程的活动。Tauli [3]指出语言规划是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涉及语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各个层面。Cooper 在 1989 年提出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4]，认为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谁是规划的制订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要理解语言规划的总体影响不能仅考虑这些关系，也应从语言规划的受众角度来分析问题也应该考虑以下因素：谁接受规划规定？接受什么规划规定？从哪儿接受规划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规划规定？Grin[5]从多样性视角指出所有“语言问题”的共同核心是多样性，因此语言政策的根本任务是多样性的管理。解决语言问题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首要目标。

目前学界广泛认可语言政策与规划包括三个维度，即宏观（macro）、中观（meso）和微观（micro）[6]。宏观维度通常指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或政体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它通常由政府部门执行，意在影响整个政体社会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中观维度着力于语言的保持、维护与复兴，是要对这些语言的保护和复

兴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它包括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语言生态批评、保护小语种的规划和措施、复兴小语种的政策、语言环境的研究、中介语交际的研究、传播小语种的研究以及中观语言规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具体研究家庭、学校、生产制造部门、管理部门、执法机构、销售与服务、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结构众多行业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微观语言规划是语言规划实践小型化、个体化和地方化发展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Kaplan 首次展开了微观规划实践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6]。在我国关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进行的研究[7, 8];有的从事语言教育政策的国别比较研究[9, 10];有的从事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研究[11, 12]。鲜见详细探索微观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从微观语言政策角度对我国多语社团进行实证性考察的研究更为鲜见。

通常，在多语社团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共同语“lingua franca”进行交际。但当在这个交际社团之中存在多于一种的共同语言，多语现象便会使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产生动态协商。在多语现象的语言交流中，语言的符号功能之外蕴含除现实交际目的之外的多种因素，多语社团中的语言政策及其影响下的交际模式也不仅限于向强势语言趋同的模式，也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多语选择的矛盾。这种多语现象以及其情境下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是影响社团内部交际的重要因素，多语现象可能会为交际提供便利也有可能引起矛盾。而这种协商过程可以通过具体情况进行描述并

解释。本文以微观语言政策的相关理论引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某多语背景乐队的排练及生活场景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与深度访谈，通过对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描述与呈现，折射出其语言生活中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与规划过程。

## 2 研究设计

质性研究主要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不可能也不需要随机抽样，样本一般比较小[13, 14]。在研究目标上，量化研究注重预测控制，质性研究注重对意义的理解；在研究对象上，量化研究强调事实的客观实在性，而质性研究强调对象的主观意向性；在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注重经验证实，而质性研究注重解释建构[15]。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以质性个案研究方法对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进行深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本研究中的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具有哪些特征？

(2) 多语社团的成员如何构建自己的学习方式以适应微观语言政策？

(3)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 2.1 进场细节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对全国 30 支多语背景乐队进行了基本情况调查。再根据调查情况，通过典型个案抽样及便利抽样的方式选出 5 支乐队共计 30 人进行焦点小组座谈。在焦点小组座谈的过程中，有 1 支乐队全体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深度访谈，2 支乐队中各 2 名成员因隐私考虑及时间原因不愿接受深度访谈。经研究者与其反复协商并详细说明研究伦理事宜，这 3 支乐队中的 1 支乐队表示愿意继续配合研究。对另外 2 支不愿意参与研究的乐队，研究者选择尊重其意愿并表示了感谢。研究者综合典型个案抽样和便利性抽样的原则，最终确定 1 支乐队（含研究对象 7 人）作为观察及深度访谈对象。

表 1 研究对象信息如下（化名）

姓名	Gibson	Fender	Paul	Ibanez	Epiphone	Gretsch	Suhr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35 岁	28 岁	36 岁	30	29	33	25
国籍	法国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学历	硕士	学士	硕士	学士	硕士	博士	学士
母语	法语、意大利语	汉语	俄语	英语	汉语	汉语	汉语
外语	英语、汉语	英语	英语、汉语	汉语、西班牙语	英语	英语、俄语	英语
外语水平	汉英语可日常交流	英语只掌握基础词汇	汉英语可日常交流	汉语西班牙语可日常交流	英语 CET4	英语 TEM8、俄语可简单交流	英语只掌握基础词汇
职责	鼓手	吉他	小号	萨克斯	贝司/队长	吉他/主唱	主唱

###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为期 5 个月（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研究者结合观察、文本以及访谈数据作为三角互证。经研究对象允许，本着受访者情绪、配合度稳定以及数据饱和的原则，研究者针对每位研究对象进行了 10 次日常排练观察、3 次演出全程观察、4 次聚会观察以及 4 次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期间无异常情况导致本研究中断。所有访谈均采用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并录音。访谈前向受访者介绍研究的目的、保密性和录音事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后对受访者表示感谢并赠予小礼物，同时将访谈录音拷贝给受访者。兼顾访谈过

程中受访者的观点、陈述及情绪变化，研究者将访谈录音转写成文字，再交 2 名同行及受访者本人进行详细核对以保证转写的完整性与正确性。此外，研究者反复对比已有数据，针对研究需要安排追踪访谈，直至理论性饱和，开始出现资料重复为止，并最终对得到的所有数据进行编号和整合。

表 2 数据收集来源概览

数据来源	描述
观察	观察其日常排练、演出及聚会等语言生活场景
日志	分析受访者的网络日志、朋友圈、微博等
半结构式访谈	制作访谈提纲、录音并转写

### 2.3 数据分析

研究者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系统、深入的交叉比对，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类属编码和主轴编码的过程对资料进行数据编码及分析[14, 16]。第一步：根据数据中信息的共现频次，将所有数据分为多个主题；第二步：对每一主题内所有意义单位进行

一、二级编码以分出类属；第三步：进一步挖掘访谈文本和一、二级编码之间的关联性和衔接性，进行三级编码。研究者在整个过程中不断与研究对象共同探讨协商，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最后邀请有关专家及受访者对编码结果进行确认以保持客观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编码方案。

表3 主题1 编码示例（仅列举部分）

码号	意义单位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RZFD003	Gretsch 做主就可以	乐队事务	语言政策	语言仲裁人产生
FTFD003	音乐创作方面是他主导	作曲编曲	影响政策因素	语言仲裁人影响
FTGS002	英语大多数时候效率高	互相交流	语种选择	外语能力影响
FTGS003	我会记下他们特有的表达	互相交流	特殊表达	社团空间语库构建
FTPA017	团队没有人会俄语	互相交流	语种选择	社团空间语库构建

注：RZ、FT 代指日志、访谈；FD、GS、PA 代指 Fender、Gibson、Paul 等研究对象；数字为具体码号

## 3 研究发现

通过对数据的梳理及综合分析，本研究发现，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主要呈现出如下动态演进过程：

### 3.1 嬗变——语言政策仲裁人的产生：“我们不怎么需要说”

在研究对象的日常排练与沟通交流中，最开始是以中文来进行的。中文为主要沟通语言，英文作为辅助交流之用。但随着交流的推进与深入，在数次排练与聚会之后，该多语社团的日常交流开始向使用英文倾斜，中文使用比例逐渐降低。多语社团的主要沟通语言演变成英语，中文变为辅助交流之用。在几位研究对象的访谈资料对该语言选择转变的描述中，都提到了关键人物 Gretsch 的作用。在该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中，多是 Gretsch 致使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发生改变。

“一开始我用中文，后来 Gretsch 用英文比较多，就顺着来了。”（Paul 访谈录）  
“Gretsch 在音乐创作方面是主导，所以他用什么语言沟通大家就用什么语言沟通。”（Epiphone 访谈录）  
“Gretsch 做主就可以啦，我们不怎么需要说，明白在说什么就行。”（Fender 访谈录）  
“音乐上我一般不提供意见，所以需要交流的时候不

多，更多的时候听他们说，我做就行。”（Suhr 访谈录）  
“我确实是说得最多的，虽然 Epiphone 是队长，但创作上我占的比例重一点，我英文也是最好的，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去说吧。”（Gretsch 访谈录）

### 3.2 推进——团队外语能力偏向：“用英语交流效率比较高”

通过进一步的交流与协商，研究对象所处多语社团的语言选择依然呈现摇摆态势，但英语作为主要沟通媒介的核心语言选择未发生改变。访谈数据显示，除上文提及的语言政策仲裁人的影响，英语所带来的交流效率以及团队成员的沟通欲望与需求，成为维系英文作为主要沟通媒介的主要因素。

“Gretsch 英文水平挺好，大多数成员多少都能明白英文，用英文交流效率比较高。”（Paul 访谈录）  
“我虽然英语一般，多少还是学过的，结合说话时候的情形，能差不多明白。”（Fender 访谈录）  
“以前有用汉语比较多啊，Gibson 还好，Paul 交流起来就困难了，用英语大家反应会快一点。”（Suhr 访谈录）  
“大家排练时交流的多是音乐上的问题，说实话用中文并没有太大优势，几个老外懂一些中文，但是音乐上的术语基本都不了解。”（Epiphone 访谈录）  
“英语毕竟是我的母语，比起中文效率肯定是高点。”（Ibanez 访谈录）



### 3.3 发展——多语社团空间语库构建：“比划一下，哼出来，不一定都用英文”

在更进一步的言语实践中，研究对象所处多语社团的语言选择开始趋于稳定。但囿于社团本身的多语特性以及社团成员各自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背景的差异，该多语社团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空间语库。这种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17, 18]特征：其超语实践表现出“音乐语言+身势语+碎片化多语+单语”的多模态多元性质。同时，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单对单交流、小组交流、整体交流、排练交流、日常交流等），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相同。

“需要帮忙我会上，不过很多都是没按语法规则说，Gretsch 懂了会帮忙解释”（Epiphone 访谈录）

“到后来英文中文还有比划都上啦，毕竟用语言解释一堆还不如直接比划一下。”（Fender 访谈录）

“鼓上面的东西，用语言描述有时候还不如用拟声的方法，一个节奏用语言描述可能要好几分钟，拟声一下，咚次哒次咚咚哒次，大家就都明白了。”（Gibson 访谈录）

“和鼓一样，发展到最后，每个乐器都发展出自己的描述体系了，有的拟声，有的是用指代。比如我常用 slow down 表示从同样速度的 16 分音符变成 8 分音符，而并不是真的要大家降低速度，大家都明白。”（Gretsch 访谈录）

“我们反正就是杂七杂八的语言和方言一起，加上互相比划，有时候还创造词汇来指代常用的一些节奏型或者是音乐要求，这样大家也不在意自己语法对不对，一开始入队的时候感觉比较困惑，不过到最后熟悉了感觉更方便打开来交流。”（Suhr 访谈录）

## 4 讨论

数据表明，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以“嬗变—推进—发展”的整体步骤，从单纯的语码转换及简单的语言选择，逐渐发展出自己所特有的空间语库，到最后呈现出超语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多语社团的成员通过碎片化语言使用、身势语辅助、拟声表达、隐喻借代等策略来完成自己在社团中的交流并对自身在社团中的角色进行确立。下面本研究将基于研究数据，

从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中所体现出的特点以及针对多语社团语言规划应注意的问题展开讨论。

### 4.1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

多语社团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多语选择的矛盾。从宏观上来说，有些语言选择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因素进行解释。然而语言的选择在多语社团成员构建其身份、实现角色需求、完成既定交际目的方面却带来了新的交际矛盾，这是上述因素无法解释的。多语者的语言选择取决于交际者，角色关系，交际域，主题，地点，交际渠道，交际类型，交际功能等因素。而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呈协商演进态势，由多语社团成员共同促成。整体来说，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呈现出以下特点与发展模式：

#### 4.1.1 “自我异化-团体趋同”模式

就如人们在同儿童交际的时候倾向于使用语法结构简单的句子，在同非母语者交谈时会放慢语速一样。说话者出于对交流效率的要求，会试图将自己的语言趋同于听话者，以尽量使自己的话语空间与听话者的话语空间交叠，减少交际障碍。在多语社区中，多语者会异化自己原有的交际模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选择“lingua franca”进行交际。这时的“lingua franca”对与社团大多数成员来说，可能都是外语。这时的“lingua franca”起到试探的作用。而随着交流的深入，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开始经历不断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之前的自我异化开始向团体趋同演进。从本质上来说，团体趋同是自我异化的目的。在这个阶段，社团各成员不仅尝试使用非母语语码与他人进行沟通，还会采纳他人提出的自己所不熟悉的语码，扩充自身的空间语库已获得更好的交流效率。

#### 4.1.2 语言仲裁人的产生及影响

在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梳理出 Gretsch 作为关键人物对该多语社团语言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影响。在该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中，Gretsch 因在音乐与语言上均占据优势，同时因为是主要创作人员，有更迫切的交流需求以及更大的交流量，因此逐渐成为语言政策仲裁人（language policy arbiter）[19]。而这种语言仲裁人的身份使得 Gretsch 在社团中拥有优先权利来创造、诠释并实施语言选择与语言政策，从而致使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发生改变。Gretsch 在音乐创作

能力、语言能力、学历以及社团地位上的多重优势成为了社团成员所要面对的现实压力（local pressures），使得他们成为了社团语言政策的接收者与执行者。

### 4.1.3 多语社团的空间语库构建与超语实践

在本研究中，多语社团中交际者最初使用的策略是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指人们交际的时候，由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20]。广义的语码转换包括方言，语体，语域的转换。根据不同的情绪以及交际目的，社团成员采用不同的语码对自己进行表达。多语社团的语言选择经过摇摆之后，维持在了一定的模式之下。但本研究中的社团中大多数人都会充当二语使用者的角色（无论是相对于汉语或者英语而言），同时该社团交流的内容有着较高的专业性、抽象性以及即时性的要求，对语言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在最初的语码转换以及多语现象之后，多语社团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空间语库。这种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特征，超语现象是多语使用者综合其所有语言及符号系统为一个整体交流体系的语言现象[17, 21]。其超语实践表现出“语言+音乐表达+副语言+碎片化多语混合”的多模多元性质。同时，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单对单交流、小组交流、整体交流、排练交流、日常交流等），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相同。

## 4.2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规划

上文讨论了多语社团的语言选择及其语言政策协商模式以及主要受到的影响。而通过对本研究中多语社团的观察与访谈，我们也发现了该多语社团交流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语言仲裁人的个体特质对社团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选择及空间语库构建模式相对较随意，没有系统性，难以对社团每个人的交流效率都起到促进的作用。社团其他成员服从于语言仲裁人的话语权利及语言权利从而被动学习，参与语言政策协商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都在降低。语言仲裁人在专业性话语权上的独裁造成其语言选择上的独裁。其次是社团空间语库语及超语现象的排他性与无规律性。空间语库对社团身份的构建以及社团成员亲密度的促进，但同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新成员加入的时候会面临很大的困惑与失落感。在针对该多语社团的观察中我们还发现，其社团空间语库的构建及超语现象呈现出较大的无规律性，其规则与使用都具有很大的场

景依赖性，这就导致了其学习曲线较陡，新成员加入时会有较明显的适应困难。

综上所述，英语使用的非本族化（nonnativisation），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出现的新趋势，也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研究的新热点[22]。多元化的语言语用及社交语用现象，体现出超越英语本族语标准的趋势。非英语本族语社团在多人交际中对形式与所指意义会进行互动协商和协同构建，并进一步形成其特有的空间语库。这种动态的协商与协同构建，有利于推进言语交际并实现相互理解。具有不同母语而缺少共有背景或互知的交际者之间除了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之外，其相互协同及策略选择显得格外重要；社团内成员在不断提升沟通效率的同时，也在进一步通过超语现象以及社团空间语库建构起术语该社团的共有背景以及互知。在交际中创造性地进行“语言+音乐表达+副语言+碎片化多语混合”的多模多元超语实践，不但未影响交际，反而对交际有较大促进。语言使用不单是语言知识的运用及信息传递的过程，除语言知识及语言能力外，还涉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非语言语境因素和语用能力。语言研究不应再只关注语言形式、语义组合及英美文化下的语用标准，而应重视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语言使用的语用维度和语用特征，重视多元化的语用知识、语用能力、语境制约、人际效果等语用表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和阐释语言使用的真实性，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语言多元化（multilingualism）和社交语用多元化（multiculturalism）背景下的语言选择与使用。

在本研究中，语言作为社团交际的工具，其选择与变化取决于社团对语言的实际需要和社团语言状况。在民族多样化及经济合作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本研究中所呈现出的语言现象有可能延续发展。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多方面整合、同化和异化并生的复杂过程，其伴随状态是多元和混杂模式[23, 24]。在语言层面上，由于资源、人口处于移动状态，语言接触更加频繁，言语社团或社区的地理边界被模糊化，传统概念中的单一、同质化的言语社团或社区日见其少，取而代之的是多维、开放的多语社团或社区。在这种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不同的语言价值重组，流动性各异，多语现象日趋普遍。因此，我们有必要用动态视角审视新型多语现象。针对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建立在对实际的话语空间为考量的基础上进行，应鼓励并协助多语社团成员灵活运用多模态多元话语组合方式构建空间语库

可有效帮助多语社团成员适应多语生活。

## 5 结语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某多语背景乐队的排练及生活场景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与深度访谈，通过对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描述与呈现，折射出其语言生活中的语言规划及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研究发现：在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中，语言政策仲裁人的影响较大；但在协商过程中，社团各成员以演进式的社会学习方式，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以构建空间语库，完成语言社会化过程并适应社团多语生活；经此所构建的多语社团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其超语实践表现出“音乐语言+身势语+碎片化多语+单语”的多模态多元性质，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相同。本文提出，针对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建立在对实际的话语空间为考量的基础上进行；鼓励并协助多语社团成员灵活运用多模态多元话语组合方式构建空间语库可有效帮助多语社团成员适应多语生活。

本文为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语规划研究提供了较为新颖的实证性案例参考，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同时由于研究方法以及关注角度的不同，也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获取数据进行互证；也可以从不同的多语社团入手，进一步探究其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

## 致谢

本研究受西南林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点“云南省教育厅 2021 年学科建设引导资金”资助。

## 参考文献

- [1] Haugen, E. Pla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 [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59, (3): 8-21.
- [2] Haugen, 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C]//*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3] Tanli, V.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J]. *Dialects*, 1968, (6): 227.
- [4] Cooper, R.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 Grin, F. Language planning as diversity management: Some analytical principles [J]. *Plurilingua*, 1999, (21): 141-156.
- [6] Kaplan, R. B. & Jr. R. B. Baldauf.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7] 赵蓉晖. 国家安全视域的中国外语规划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12-16.
- [8] 李宇明. 语言也是“硬实力”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 68-72.
- [9] 金志茹. 澳大利亚国情与语言政策研究 [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 66-69.
- [10] 沈骑. 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与趋势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 (9): 64-68.
- [11] 束定芳.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3): 426-435.
- [12] 戴炜栋. 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战略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0, (6): 80-85.
- [13] Creswell, J. W. 201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14]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15] 郑新民. 英语博士成长札记 [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7.
- [16] Glaser, B. &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search* [M]. Chicago: Aldine M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1-2.
- [17] Garc á, O. Education, multilingualism and translanguag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 In: Ajit Mohanty, Minati Panda, Robert Phillipson and Tove Skutnabb-Kangas (Eds). *Multilingual Education for Social Justice: Globalising the local*. New Delhi: Orient Blackswan, 2009, pp. 128-145.
- [18] Li, W & Zhu, H. Translanguaging Identities and Ideologies: Creating Transnational Space Through Flexible Multilingual Practices Amongst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UK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3, 34 (5): 516-535.
- [19] Johnson, D. C. Positioning the language policy arbiter: Governmentality and footing in the school district of Philadelphia[C]. In Tollefson, James W. (Ed.).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2nd Edition)*. Florence, KY, USA: Routledge, 2012.
- [20] Coulmas, F.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21] Suresh, C. "Codemeshing in Academic Writing: Identifying Teachable Strategies of Translanguaging"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1, 95(3): 401-417.
- [22] Graddol, D. *English next: 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M]. London: British Council, 2006.
- [23] Hall, S.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C] In A.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9-40.
- [24] Kellner, D.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M]. Cambridge, UK and Baltimore, MD: Polity Press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作者简介

### 姚洋

1985 年生，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

E-mail: yaoyang@swfu.edu.cn

### 苏秋军

1978 年生，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语言学、外语教师发展。

E-mail: james\_su@swfu.edu.cn